

《弇山堂别集》成书与版本考*

吕浩

内容摘要:王世贞史学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经皆史的观念下,王世贞把他搜集到的明代史料归入《弇州山人四部稿》的“说部”,而《弇山堂别集》的成书正是依赖那些从《四部稿》中剥离的史料,并进而有所修订和增补。《别集》成书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梓人翁良瑜初刊于金陵雨金堂。初刊本并没有万历庚寅年的刊刻木记,而另一个有着“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鐫行”木记的版本有刻工蔡朝光,这个所谓“万历庚寅本”在版式和内容上明显可以看出是一个经过修订且重新刊刻的版本,它的刊刻年代应晚于万历十八年。据《弇州山人续稿序》、《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皇明盛事述》(手抄本)等文献可推知,这个修订重刻本很可能刊刻于万历二十年或稍后。清代《四库全书》本和广雅书局本的底本都是重刻本。

关键词: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 翁良瑜初刊本 蔡朝光刻本

在明代史学著作中,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具有重要地位。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魏连科点校本,该书以清代广雅书局本为底本,校本是万历本(实际上是翁良瑜雨金堂刊本),这也是《弇山堂别集》(以下简称《别集》)目前最为通行的本子。我们在整理“王世贞全集”的过程中发现,《别集》有个较为复杂的文献系统,其成书过程与版本流变同样复杂。

一、《别集》成书考

除了残本或手抄单行本,《别集》一般著录为一百卷。然而,《弇州山人续稿》(以下简称《续稿》)卷五十四《弇山堂别集小序》(为区别和称说便利,将此序简称为《续稿·小序》,而将《弇山堂别集》卷前的《弇山堂别集小序》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12&ZD159)阶段性成果。

简称《小序》)曰:“寻得间出之,编次成帙,凡九十卷,携来金陵署中。梓人翁生见而异之,固请付剞劂。”^①可见,梓人翁良瑜当初见到的《别集》书稿为九十卷,等到翁良瑜把它刊刻出来,已是一百卷。卷数的增加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别集》书稿在内容上有新材料增入,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史乘考误》的编入。二是翁良瑜出于谋利的需要重新分合了部分卷帙。《别集·中官考》内容大多与前文重复,《奇事述》、《异典述》内容在不同版本间分卷各异,或即其证。

王世贞《小序》曰:“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典故与阅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从故相徐公所得,尽窥金匱、石室之藏,窃亦欲藉薜萝之日,一从事于龙门、兰台遗响,庶几昭代之盛不至恣恣尔。甫欲命管而病妒之。既而自惟材力绵浅,一不称也;所睹章奏竿尺赋颂之类,鲜足哀者,二不称也;是非小有不当,流祸后世,三不称也。而是时倡道者谓王子毋受役于笔研以凿性灵,自是绝意不复作。其他有所闻见,偶书之赫蹄,以数篋贮藏。”^②王世贞原本是要编撰一部当代史,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编成了一个分类史料集。在那“数篋”之中,有着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史料,这些史料本身也需要不断更新,涉及的人物、官职也存在变量。从内容上看,《别集》已更新到万历十八年。《别集·奇事述·大臣姓名同》:“两陈于陞:万历十八年,一为詹事学士,一为左副都御史班正。”^③《别集·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表》:“孙丕扬,陕西富平人。由进士,万历十八年。”^④另外,这些史料的归纳和归类也存在变量,这一点从《别集》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实,《别集》内容在王世贞在世时一直在变化中,一百八十卷本《弇州山人四部稿》(以下简称《四部稿》)内含有《野史家乘考误》上中下三卷,共177条。上海图书馆藏一百七十四卷本《四部稿》后附《史乘考误》七卷、《盛事述》三卷、《异典述》五卷、《异事述》一卷,其中《史乘考误》七卷共286条。《别集》中《史乘考误》十一卷、《盛事述》五卷、《异典述》十卷、《奇事述》四卷,其中《史乘考误》十一卷共380条。从三个版本所收的《史乘考误》条目数就可看出其中的巨大差异,若比较相同条目的具体内容,亦可见其中差异。三卷的《野史家乘考误》卷上:

(《剪胜野闻》)又言:司徒李伯升先以国情输我师,帝以为佞臣,命斩以示士诚。《野记》言亦同。按,伯升降后累迁中书平章政事,洪武中乃卒。

又言:徐太傅追元顺帝……按,常平章卒于军,原无还京师,又太傅所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四,明刻本,叶二十一。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首序,翁良瑜雨金堂刊本,叶一至三。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六,叶十四。

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十三,叶六。《明神宗实录》将孙丕扬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系于万历十七年十月,万历十八年七月乞休回籍。而《别集》翁良瑜雨金堂刊本若是刊刻完成于万历十七年,显然书中不应出现“万历十八年”字样。

以得全者，恭顺耳，此言大诬。^①

七卷的《史乘考误》卷一^②、十一卷的《史乘考误》卷一^③皆作：

（《剪胜野闻》）又言：司徒李伯升先以国情输我师，帝以为佞臣，命斩以示士诚。《野记》言亦同。按，伯升降后累迁中书平章政事，洪武中乃卒。子为世袭指挥。

又言：徐太傅追元顺帝……按，下大都后，达与常平章同破山西扩廓，至陕而分兵，达讨定西王保保，而平章袭应昌。平章卒于军，以二年八月柩至龙江。达以十一月班师，入见，上抚劳之。此言何从起也？况太傅之所以功名令终者，忠顺耳，拔剑斩关、称病尔汝之说，虽病狂丧心者不为之。书生妄语可笑。

其差异主要是按语不同，明显表现出王世贞前后修改的痕迹。

《别集》虽被《四库全书》归入史部杂史类，但其内容距离史书事体相去甚远。《四库全书总目》称：“又所为各表，多不依旁行斜上之体，所失正与雷礼相同。其《盛事》、《奇事》诸述，颇涉诙谐，亦非史体。”^④正因为《别集》大部分内容并非史体，其出没于《四部稿》及《续稿》也就不足为奇了。王世贞早年对史的认识比较宽泛，《艺苑卮言》曰：“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曰编年，曰本纪，曰志，曰表，曰书，曰世家，曰列传，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记，曰碑，曰碣，曰铭，曰述，史之变文也；曰训，曰诰，曰命，曰册，曰诏，曰令，曰教，曰札，曰上书，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启，曰笺，曰弹事，曰奏记，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驳，曰喻，曰尺牍，史之用也；曰论，曰辨，曰说，曰解，曰难，曰议，史之实也；曰赞，曰颂，曰箴，曰哀，曰谏，曰悲，史之华也。虽然，颂即四诗之一，赞、箴、铭、哀、谏皆其余音也。附之于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从众。”^⑤这也可为《史乘考误》、《盛事述》、《异典述》、《奇事述》及各篇序言出现于《四部稿》及《续稿》作注脚。

其见于《四部稿》者已如上述，《史乘考误》、《盛事述》、《异典述》、《异事述》的大部分内容都附于《四部稿》后，属于“说部”。其收入后出之《续稿》者有各篇序言，如《同姓诸王表序》、《公侯伯表总序》、《高帝功臣公侯伯表序》、《恩泽公侯伯表序》、《追封王公侯伯表序》、《公孤表序》、《东宫三师表序》、《赠公孤官臣表序》、《柱国表序》、《内阁辅臣年表序》、《中书省表序》、《六部尚书表序》、《督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金事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七十八，明刻本，叶二至三。

②王世贞：《弇州集·史乘考误》卷一，明世经堂刊本，叶四至五。

③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叶四至五。

④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466页。

⑤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四，明世经堂刻本，叶十三。

表序》、《中官考序》、《亲征考序》、《科举考序》、《谥法考序》、《皇明盛事述序》、《皇明异典述序》、《皇明奇事述序》、《弇山堂别集小序》等二十二篇,属于“文部”。

针对《四部稿》后所附《史乘考误》、《盛事述》、《异典述》、《异事述》等内容,王世贞曾致信徐孟孺曰:“所谓《卮言》、《别集》者,易之曰《宛委馀编》,而斥《盛事》、《异典》别行之,公家赐小珰宫姬事亦增录矣。”^①可见,《弇山堂别集》的形成是王世贞“四部”概念逐渐确定之后的事情,也存在一个逐渐增录的过程。其《盛事述》、《异典述》及《异事述》是相对成熟的资料,因而它们或见于其他文集,或有单行本传世。它们连同《史乘考误》成为《别集》的核心内容,也最能代表王世贞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

《别集》的核心内容源于《四部稿》,其起因是《宛委馀编》的诞生导致《盛事》、《异典》被剥离出《四部稿》。从《四部稿》版本流变看,一百七十四卷本后附《史乘考误》七卷、《皇明盛事述》三卷、《皇明异典述》五卷和《皇明异事述》一卷,而在一百八十卷本中只剩下《史乘考误》三卷,显然被斥别行的不只是《盛事述》、《异典述》,还有《异事述》(刻入《别集》时改称《皇明奇事述》),同时增录的还有“公家赐小珰宫姬事”(即《别集》中《中官考》部分的内容)。然而,就传世文献看,单行的《皇明盛事述》三卷与《皇明异事述》一卷为一函三册,《皇明异典述》五卷为一函二册,只是从《四部稿》中剥离,重印装册而已,并未重新刊刻,内容上也无增补删削。换句话说,所谓增录“公家赐小珰宫姬事”,应是针对《别集》而言,而非《盛事述》、《异典述》等单行本。可以说,编入《别集》的《盛事述》、《异典述》、《奇事述》已非《四部稿》中原来的面貌,而是有较大规模的增补及少量删削。其增补者如《盛事述》由三卷(127条)增至五卷(180条),《异典述》由五卷(202条)增至十卷(307条),《异事述》由一卷(45条)增至《奇事述》四卷(118条)。其删削者如《盛事述》“子孙显圣”、“文臣父子继任”、“吏兵二任”、“吏部内阁”等11条删削,《异典述》“宗室授官”、“亲王礼物”、“先后两封王”等13条删削,《异事述》“地望相同”、“淇成二公不为大将”、“文官夷名”等8条删削。削稿问题拟另文讨论,兹不赘述。

可以说,《别集》最初的那些资料早在万历四年十月王世贞被令回籍听用后便已成型^②,到万历十七年赴任刑部尚书,这段里居期也是《别集》逐渐成书的时间,其中很重要的事件就是王世贞从故相徐达家中得到了不少史料。到王世贞把书稿带去金陵时,这时的书稿只有九十卷,其中很可能不包含《史乘考误》的内容。因为一百八十卷本《四部稿》仍包含《史乘考误》;且刻入《别集》

①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叶十八。

②《弇州山人四部稿》成书于万历五年,其后附有《盛事述》、《异典述》、《异事述》及《野史家乘考误》等内容。

的《史乘考误》分为十一卷,也在规模上与十卷的容量大体相当。

从《小序》可以看出,王世贞把《别集》书稿携来金陵是在他任南京刑部尚书时,而王世贞升南京刑部尚书是在万历十七年六月,八月赴金陵履任,八月二十五日抵金陵,万历十八年三月致仕居里^①。因而,翁良瑜刊刻《别集》最早也在万历十七年九月。陈文烛万历十八年冬给《别集》写序。国家图书馆藏《别集》(藏书号 13392)无陈文烛序,应是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其刊行当在万历十七年末至万历十八年上半年。王世贞在万历十八年秋《弇州山人续稿》编成之时嘱托胡应麟作序并校对,是否可以推测,陈文烛在受托作序时也有校对的请托。随之产生的挖改本不仅改掉了翁良瑜雨金堂本序言中的个别词句,正文部分也时有改订,以致又有重新刊刻的本子,说详下版本考。

二、《别集》版本考

翁良瑜雨金堂刊本是《别集》最早的刊本,这一点可以在王世贞的《小序》中得到印证。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都藏有翁良瑜雨金堂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本(馆藏号 13392)的板式为:左右双边,10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序文只有《小序》一篇,无陈文烛序。《小序》板心处刻有“刘岳”字样。目录前有“太末翁良瑜叔佩梓”字样,目录末刻有“斯集刊于南京国子监前买者须认仁山翁氏雨金堂卖书处三字为记”字样,目录第一叶版心刻有“王应龙刊”字样。正文每卷第一叶版心刻有“雨金堂”字样。卷十九末尾有“太末翁良瑜叔佩校梓”字样。卷十一叶二十版心有“三百〇六”字样,表示该叶共306字。其后时有版心刻字数者,如卷十三叶十九有“二百八十一”,卷十四叶一有“毛三百二”,卷十四叶二有“三百三十四”,卷十四叶四有“三、〇三”(其中的、即表示百字),卷十四叶五有“三、八十五”,卷八十五叶二有“四百”。值得一提的是“毛三百二”,这里并非大致302字的意思,因为该叶正好302字,这里的“毛”很可能是刻工名字或名字的简称。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单序本应是《别集》初刊本(以下称初刊本)。南京图书馆藏本有陈文烛序,其他板式、文字字形及边栏断线等都与国图藏本无别,应是雨金堂初刊本补陈序印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双序本《别集》(馆藏号 8827)。

翁良瑜初刊本刊出时间为万历十八年,其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序言。《续稿·小序》曰:“寻得间出之,编次成帙,凡九十卷,携来金陵署中。梓人翁生见而异之,固请付剞劂。”^②可知携至金陵的书稿因梓人翁良瑜的“固请”才得以付梓,因而翁良瑜刊本为初刊本。《小序》末则有“秋官尚书吴郡王世贞撰”字样,可知王世贞携书稿去金陵署中指的是他赴任南京刑部尚书。

^①郑利华:《王世贞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347页。

^②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四,叶二十一。

二是印章。《小序》末有“大司寇章”，也指示的是南京刑部尚书一职。

三是《别集》内容。《别集》史料中有万历十八年者两处，已见上文。这两处史料表明《别集》刻成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而王世贞赴任南京刑部尚书是在万历十七年，并于八月二十五日抵达金陵，因而《别集》刊刻时间应是万历十七年下半年至十八年上半年。之所以把下限定在十八年上半年，原因有三：一是万历十八年正月升太常寺卿陈于陞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①。二是孙丕扬由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乞休回籍在万历十八年七月丙午^②。三是陈文烛给《别集》写序是万历十八年岁末，而《别集》翁良瑜雨金堂本初无陈序，陈序系后增人。

国家图书馆还藏有一个残本（馆藏号 XD3310，缺卷 40-43、卷 47-57）^③，左右双边，10 行 20 字，白口，单黑鱼尾。有王世贞《小序》与陈文烛序两篇，《小序》版心有“刘岳”字样。目录第一叶版心有“王应龙刊”字样，目录前后没有如初刊本那样的牌记和说明（应是挖改所致）。正文每卷第一叶版心刻有“雨金堂”字样。卷十九末叶未见有如初刊本“太末翁良瑜叔佩校梓”那样的牌记。板心所刻字数同于初刊本。残本与初刊本不一样的地方还不止上述种种，《小序》亦有不同，残本“乃好事者见而异之”，而初刊本作“梓人翁生见而异之”；残本以“其用如是而已”结尾，而初刊本此句后还有“而翁生者乃欲强以灾木，何也？惜乎，吾见若之懵于什一息也”数句。陈文烛《弇山堂别集序》也有改动，残本“梓生叔佩者”，初刊本作“翁生叔佩者”。从正文内容上说，残本卷一叶九“华阳王一位”，而初刊本卷一叶九为“华阳王共二十七位”。可见，即便是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也有版本上的不同。以上信息表明，翁良瑜雨金堂刊本曾经过挖改，挖改主要是针对内容上的错误进行了更正，同时也删除了梓人翁良瑜的相关信息（在陈文烛序中只改“翁生”为“梓生”，却保留了后边的“叔佩”，算是修改不够彻底）。综上，这个残本可以认定为雨金堂初刊本加陈序印本的挖改本。

挖改本是怎样形成的，挖改于何年？这些问题可以从王锡爵的一些记述中得到线索。王锡爵《弇州山人续稿序》曰：“公自司寇归，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骏。俄而，骏没。长子驾部君续其事，两阅岁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贾人手，稍增损驳乱。其间，诸子乃聚诸同志特就原稿订疑刊谬，不以己意有所甲乙。”^④此处《弇州外集》应是指《弇山堂别集》，“贾

①《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九“万历十八年正月己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第4106页。

②《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二十五“万历十八年七月丙午”条，第4180页。

③这个本子曾为郑振铎先生收藏。

④王锡爵：《弇州山人续稿序》，《王文肃公文集》卷一，《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人”应是指翁良瑜。翁良瑜初刊本校刻不精,需要“订疑刊谬”,挖改本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而且王锡爵本人很可能也参与其中,《别集》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臣又见大学士王锡爵之辨疏内举祁奚为言……锡爵为相三年矣,不闻与人为善,而闻与人饰非。自锡爵趋邪,而忠臣贤士悉被斥远,而佞夫险人躐跻显要。”^①在挖改本中改成了“臣又见大学士王某之辨疏内举祁奚为言……某为相三年矣,不闻与人为善,而闻与人饰非。自某趋邪,而忠臣贤士悉被斥远,而佞夫险人躐跻显要”。此处内容涉及王锡爵名声,可谓讳莫如深,不改不快。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曰:“公所著有《四部稿》,世已刻行。《四部》有《后集》,未刻。有《别稿》,未删定,藏于家。”^②此处《别稿》也应是指《弇山堂别集》,在王世贞去世时还未删定。这里的删定与“订疑刊谬”所指相同。也就是说,《别集》挖改本的年代应在万历十八年王世贞去世之后。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个单行手抄本《皇明盛事述》五卷,经过考证,这个本子也是在“订疑刊谬”时期形成的,它的年代大体稍晚于万历二十年,因为其中个别地方增入了万历二十年的史实^③。

与雨金堂本挖改本不同,《别集》还有一个重新刊刻的本子,这个版本有两篇序,《小序》首叶板心刻“蔡朝光刊”字样,次叶板心刻“朝光”字样,陈文烛序末叶板心刻“蔡朝光刊”字样(以下简称此本为蔡本)。蔡本板式为:四周单边(卷三十一以后的部分书叶为左右双边),10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蔡本目录内容分上下两栏,比翁良瑜雨金堂刊本紧凑。蔡本末尾有牌记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根据这个牌记,此本应刊刻于万历十八年。然而,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刊刻于万历十八年,蔡本如果也刊刻于万历十八年,则同一年在金陵有两家书坊刊刻了《别集》,而且两个版本的修改与承传关系明显,这显然不合情理。因而,这个牌记颇有疑点。蔡本与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一是整体内容与分卷同。二是蔡本在字形、避讳、空字、空行、换行等形式上都极力模仿翁良瑜雨金堂本,如陈文烛序叶一第8行“来”字形作“末”,第8行的两个“乱”字字形,蔡本与翁良瑜雨金堂本皆同。二本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镌刻字形风格不同,二是局部内容不同。蔡本字体与初刊本明显不同,初刊本字体整齐严谨,为颜体字;蔡本字体偏软,为赵体字。从内容上看,初刊本与蔡本《小序》不同,蔡本去除了“翁良瑜”的信息,以“其用如是而已”煞尾,其未尽之意昭然。卷二叶十四“亦可附见”,初刊本后有双行小字注29字,蔡本无。二本卷四末尾版面不同。以上不同之处主要表现为蔡本修订了翁良瑜雨金堂本,蔡本可以说是改序修订重刻本。从传承关系看,这个重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叶二十九至三十。

②王锡爵:《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王文肃公文集》卷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册,第16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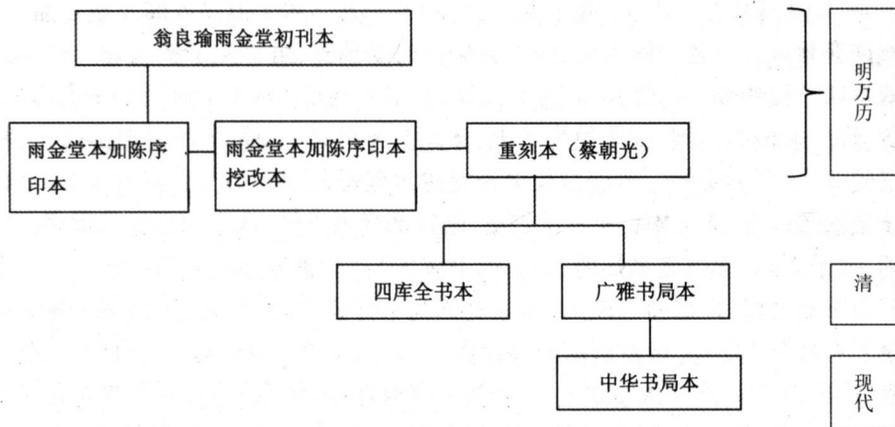
③参见拙作《明抄本〈皇明盛事述〉考辨》,《兰州学刊》2015年第2期,第24-29页。

刻本是在挖改本的基础上重刻的。

四库全书本《别集》一百卷,在两江总督采进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主要是避讳改字。四库本序言只有一篇,即《弇山堂别集原序》,该序与上文所述蔡本的序相同,可知两江总督采进的应是蔡本,即有刻工“蔡朝光”的重刻本。这个本子经馆臣修改后,编入《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

清代广雅书局刊本《别集》,板式为:四周单边,11行24字,黑口,单黑鱼尾。每叶板心刻“广雅书局刊”字样,每卷末都有校书人3人,如卷一、卷二、卷三末皆有“宿松罗忠济初校,顺德罗棻覆校,太仓陆继辉再覆校”。书末有“番禺叶佩琮初校,商城黄关同覆校,太仓钱清诒再覆校”。参与校勘的还有:江阴陈名慎,番禺许之璇,武冈邓国猷。该版本两篇序,陈文烛序在前,王世贞《小序》在后,《小序》内容同蔡朝光重刻本,可知蔡朝光重刻本是清代较为通行的本子,而翁良瑜雨金堂本已少见。国外一些著名图书馆收藏的《别集》,有蔡朝光重刻本而无翁良瑜雨金堂刊本,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别集》的版本情况如下图所示:



三、关于蔡本的疑问

蔡本书末有牌记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镌行”,“万历庚寅”即万历十八年,“孟冬”即农历十月,“穀旦”即良辰吉日。按照这个牌记,这个版本刊刻于金陵,完工于万历十八年十月。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把这个版本登记为万历十八年刻本,根据就是书末的这个牌记。然而,这个牌记十分可疑。主要疑点是这个刊本与翁良瑜初刊本几乎同时,且都是在金陵刊刻,不合情理。上文谈到翁良瑜初刊本与挖改本,这两个本子与蔡本的关系已如上《别集》版本示意图,我们再从内容上做一些比较。

1.初刊本《小序》叶三“梓人翁生见而异之”,挖改本作“乃好事者见而异之”,蔡本同挖改本。

2.初刊本《小序》叶三“而翁生者乃欲强以灾木,何也?惜乎,吾见若之懵

于什一息也”。挖改本无此几句，蔡本亦无。

3.初刊本陈《序》叶一“翁生叔佩者”，挖改本作“梓生叔佩者”，蔡本同挖改本。

4.初刊本卷一叶六“未之逝国”，挖改本作“未之逝国封”，蔡本作“逝未受封”。

5.初刊本卷一叶七“雍靖王祐樛”，挖改本作“雍靖王祐櫛”，蔡本同挖改本。

6.初刊本卷一叶八“平阳西河等王四位，共一十二位”，挖改本作“平阳西河等王共一十二位”，蔡本与挖改本同。

7.初刊本卷一叶十三“安陆侯吴复二女”，挖改本作“安陆侯吴复二孙女”，蔡本同挖改本。

8.初刊本卷一叶十五“荆八王”，挖改本作“荆七王”，蔡本同挖改本。

9.初刊本卷一叶十六“直丘”，挖改本作“真丘”，蔡本同挖改本。

10.初刊本卷一叶十八“定国徐景昌”，挖改本作“定国徐景昌翊国郭勋”，蔡本同挖改本。

11.初刊本卷二叶五“凡十九家，共四十一人。然无俱在内阁及至一品者，唯许襄毅进在正德中赐玉带，及王公华生时受伯封，可称父子腰玉耳。杨少师博第四子俊卿今为都督同知，虽文武异途，亦并腰玉。内王与林及见子为尚书，詹、许二家俱为太宰，倪氏俱为学士，林氏俱为司成。而许父子兄弟共四人，林三代四人，尤为卓异。燕府左长史朱复初为燕相，位尚书上，后特赠尚书，子睿仕至刑部尚书，亦可附见。右都御史、赠兵部尚书王忬，南京刑部尚书世贞。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俊民”。挖改本作“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杨公博，户部尚书俊民。南京礼部尚书孙公陞，南京吏部尚书籛。先父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讳，南京刑部尚书世贞。凡二十二家，四十七人。内詹、许俱太宰，倪氏俱学士，林氏俱司成。又朱复为燕府左相，位尚书上，而子濬为刑部尚书。杨公博为少师，而次子俊卿至都督同知，虽文武异途，然俱腰玉，皆可纪也”。蔡本同挖改本。

12.初刊本卷二叶七“少师、吏部尚书杨公博，兵部左侍郎俊民。兵部尚书李公燧”。挖改本作“署兵部尚书李公燧”。蔡本同挖改本。

以上数条足以证明蔡本与初刊本、挖改本之间的传承关系，即初刊本在前，挖改本在后，蔡本又在挖改本之后，且蔡本参照了挖改本无疑。

从时间上说，初刊本的完成时间为万历十八年比较可信，陈文烛给《别集》写序是在万历十八年冬，这时的《别集》恐怕只有初刊本。而挖改本与蔡本在万历十八年之后无疑，挖改与重刻的原因上文已经说明。这就意味着蔡本后的那个牌记系伪托。

为什么要伪托？伪托的目的或是要遮蔽翁良瑜初刊本，那么这个初刊本除了“稍增损驳乱”，还有什么问题呢？翁良瑜初刊本卷十六叶十七“叔姪名位事体相同”条曰：“潘珍与从子旦，壬戌、乙丑登第。珍以兵左侍理部事，旦以兵左

侍督两广，同岁议安南，忤旨，归。珍戊申卒，年七十二，赠右都御史；上己酉卒，年七十四，赠尚书”。其中的“上”字为“旦”字之误，指潘珍的从子旦。初刊本竟然误刻作“上”，这已经不仅仅是避讳的问题了，倘若以此本行世，王家迟早会因此遭祸。更有甚者，初刊本卷三十一叶三将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峻德成功”中的“武”字漏刻了。这些错误在挖改本中已得到更正，但挖改本也不尽善。如初刊本卷二十六叶十六第10行“上”字前未依例空格避讳，挖改本未改。初刊本卷三十叶一第17行“上”字亦未避讳，挖改本同。另外，初刊本卷二十八叶十二第3行“旨”字前有一空格，挖改本于空格处补“怀”字，反而没有避讳。重新刊刻《别集》，且拟定牌记为“万历庚寅”，再加上在王世贞碑志及行状中不提《别集》初刊本的存在，这些做法或者是为避祸而不得已为之。

如上所述，《别集》版本可能的情形是，王家不满翁良瑜初刊本“增损驳乱”，“诸子乃聚诸同志特就原稿订疑刊谬”，最初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在原版上挖改更正，形成了初刊本的挖改本。之后发现挖改难以有效遮蔽初刊本，如版心“雨金堂”字样及不少版心中的字数信息犹在，便索性重刻了《别集》，初刊本的刻工刘岳、王应龙等在重刻本中均删去，还在书末刻上牌记“大明万历庚寅孟冬穀旦金陵鏤行”，用以遮蔽万历十八年的翁良瑜雨金堂初刊本。

关于蔡本的第二个疑问就是蔡朝光其人，这位刻工名字不见于《古籍刻工名录》^①、《明代刊工姓名索引》^②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③，牌记中的“金陵鏤行”也未说明刻坊名称，这些信息几乎是无效信息。也许正是这些无效信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这个版本刊刻的时间与地点，以达到用重刻本遮蔽和替代初刊本的效果。

另外，蔡本的板式信息在图书馆的著录是：四周单边，10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这个信息中只有“四周单边”与初刊本及挖改本不同，初刊本与挖改本是左右双边。然而，蔡本“四周单边”这个信息并不十分准确，其部分叶面也是“左右双边”，如卷三十一叶一至八、叶十、叶十三至十六、叶十九至二十等共有193叶为左右双边，占全书的8.6%。

这些左右双边的书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把蔡本左右双边的书叶跟初刊本及挖改本相应的书叶做了比较，发现蔡本这些左右双边的书叶也是重新雕板，而不是直接移植初刊本的板。这些左右双边的书叶大多集中在“帝系”、“诸王”、“亲王”、“郡王”及各类“表”，初刊本的这部分内容最不易出错，换句话说，这部分内容几乎不需要挖改或重新刻。既然重刻了，为什么还要自坏板式，刻出一些左右双边的叶面呢？通过仔细对照，我们发现，重刻本对挖

①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

②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

改本板式的模仿显得十分突出^①。这种模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内容的断续与换行。初刊本、挖改本与重刻本均存在一些非正常断续与换行之处，如重刻本卷六十一叶八正文中间有6个空行，挖改本同。重刻本卷六十三叶七、叶十二都有多个空行，挖改本同。重刻本卷六十四叶五换行很不正常，中间还有空行，挖改本同。重刻本卷六十四叶十四非正常换行，挖改本同。

二是板心叶码下的横线。初刊本与挖改本不少书叶板心下部刻有当叶字数，字数上方刻有一道横线。重刻本虽很少刻有字数，但不少书叶板心下部还是刻有一道横线。如卷三十一叶一、十五、十六，卷三十三叶六至十、叶十三至二十，卷四十三叶五、六、九、十等书叶板心下部皆有横线。有类似横线的书叶共有53个。

三是板心下部刻当叶字数。初刊本不少书叶板心下部刻有当叶字数，重刻本也有少量，如卷四十叶一板心刻“三〇六十三”，表示该叶有363字（实刻360字）。重刻本板心刻字数的书叶共有65个。

当然，在字形上，重刻本对挖改本的模仿也十分突出，包括一些讹俗字形。初刊本每卷第一叶都记为“乙”，重刻本一般记为“一”，但重刻本卷四十三与卷五十二第一叶都记为“乙”。初刊本各卷首一般都注明“吴郡王世贞元美著”，但个别卷首为“吴郡王世贞元美编”，如卷三十七、卷三十九、卷六十六、卷六十九、卷八十六、卷九十、卷九十六皆标注为“吴郡王世贞元美编”。重刻本也是上述各卷标注为“吴郡王世贞元美编”。更明显的是，重刻本在卷八十六、卷九十两处的“编”字作“編”，也是模仿挖改本。“元美”的“美”字作“美”或作“美”，重刻本也照样模仿。就是明显错误，重刻本也照搬，如挖改本卷三十八卷首“吴郡王世贞元着著”，“着”字系“美”字之误，重刻本依旧刻成了“着”。另外，初刊本及挖改本卷三十一叶二上的符号“◇”，这个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重刻本还是在相同的位置刻了相同的符号。^②

既然重刻本在诸多方面模仿挖改本，那么它在“左右双边”上模仿初刊本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些模仿可以说是重刻本以挖改本为底本的见证，也是挖改本在重刻本上留下的烙印。

通过以上分析，重刻本在《别集》版本系统中的位置已经很清楚，其书末的牌记应属伪托。这个版本究竟刻于何时，一时难以考定。但从王家聚众修订《别集》这件事来看，重刻《别集》必是不久以后的事，因而这个重刻本若著录为“万历本”应该问题不大。

【作者简介】吕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古文献学，古代汉语。

^①从版式上说，挖改本版式实际上也代表着初刊本的版式。为行文方便，下文谈重刻本模仿问题时只用“挖改本”作比较。

^②当然，重刻本也不是一一切都照搬，个别地方与挖改本也不一样。如挖改本卷三十三叶十四“正德二年正月初五日薨”，重刻本“薨”字的位置是墨块。“薨”字不属避讳，且本叶有多个“薨”字，不明此处为何以墨块替代“薨”字。